

“大系”传统与《香港文学大系》

香港有文学

□陈国球

筹备5年,《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12卷的首6卷:新诗卷、散文两卷、儿童文学卷、旧体文学卷、通俗文学卷,已经陆续面世。余下的小说两卷、评论两卷、戏剧卷、文学史料卷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出齐。这个在香港文艺界酝酿30年的构想,终于实现。

香港一直有很多文学作品,却又一直缺乏一本从本地观点与角度撰写的文学史。上世纪80年代,香港回归在即,“香港文学”顿成中外文化人和学术界的议题,此时香港文坛才有检视过去、梳理自身历史的意识。“香港有没有文学”、“什么是香港文学”等问题陆续浮现。虽然当时已有编纂香港文学大系的声音,但直至香港回归,始终没有人做出来。反而在1997年前后,多部非本土撰写的香港文学史匆匆出版,其中不乏疏漏和误解,于是香港文艺界又再有整理香港文学资料的议论,为香港观点的文学史书写开路。

《大系》作为文学史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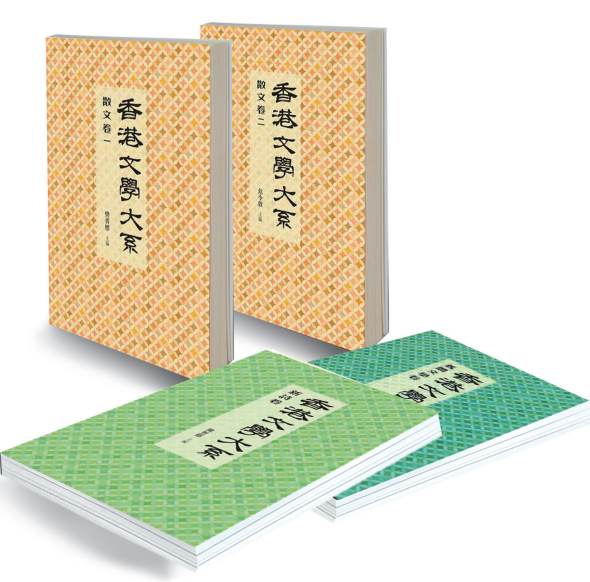
1935年至1936年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被认为是后来“新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依据。当年年轻的赵家璧召集了胡适、鲁迅、茅盾、朱自清、郁达夫等名作家,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0集,包括:理论类的“建设理论、文学论争”两集,创作类的“小说、散文、新诗、戏剧”7集,和“史料、索引”一集,各集编辑各自撰写导言,容许各人论述不同观点,加上由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所写的《总序》,开创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结构模型——赋予文化史意义的“总序”、从理论与思潮搭建的框架、主要文类的文本选择,经纬交织的导言,加上史料索引作为铺垫——算不上紧密,但能互相勾连,又留有一定的诠释空间,反而有可能胜过表面上更周密,纯粹以叙述手段完成的传统文学史书写,更能彰显历史意识的深度。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出版后,直至1984年,第二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才以承继正统的姿态面世,直至2009年已出版至第五辑,即《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

除了内地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外,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早已各自有“文学大系”,特别是台湾的几套“文学大系”,为“大系”这种形式赋予了更多重、更立体的意思。1972年余光中主持《中国现代文学大系》的编纂,编选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小说、散文、诗三种文类作品,合成8辑。在巨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以后,他继续主持了两次“大系”的编纂工作:由九歌出版社先后于1989年出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9》,2003年出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貳)——台湾1989-2003》。

在台湾思考文学史或者文学传统,难免要联系到“中国”这个概念。在巨人版《大系·总序》中,余光中的重点是把1949年以后台湾的“现代文学”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相提并论,也讲到台湾文学“与昨日脱节”——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作品的陌生——带来的影响;向更古老的中国古典传统和远方的欧美文学学习。他又解释以“大系”为名的意义:“除了精选各家的佳作之外,更企图从而展示历史的发展和文学的演变,为20年来的文学创作留下一笔颇为可观的产业。”

从两个系列的“文学大系”中,可归纳出这种编纂传



统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文学大系”是对一个范围的文学(一个时段、一个国家/地区)作系统的整理,以多册的、“成套的”文本形式面世。

二、这多册成套的文学书要能自成结构;结构的方式和目的在于立体地呈现其指涉的文学史;“立体”的意义在于超越叙事体的文学史书写和示例式的选本的限制和片面。

三、“时间”与“记忆”、“现实”与“历史”是否能相互作用,是衡量“文学大系”编撰质量的关键。

四、“国家文学”或者“地区文学”的“划界”与“越界”,是“文学大系”恒常要面临的挑战。

定义“香港文学”困难重重

在《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的编纂过程中,编委会曾就“香港文学”、“香港作家”范围的界划热烈争辩。作者需要在香港居住多久、作品内容写香港与否该不该成为考虑因素,文学史意义以香港为限还是包括对整体中国文学的作用……很难有一致的结论。最后,在编纂过程中,编委会斟酌采用了以下几个原则:

“香港文学”应与“在香港出现的文学”有所区别,比如痖弦的诗集《苦苓林的一夜》在香港出版,但此集不应算作香港文学;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居住在香港的作者,在香港的出版平台如报章、杂志、单行本、合集等发表的作品(例如倡伦、刘火子在香港发表的作品)可以入选;在一段相当时期内居住在香港的作者,在香港以外地方发表的作品(例如谢晨光在上海等地发表的作品)也可以酌情入选;受众、读者主要是在香港,而又对香港文学的发展造成影响的作品如小平的“女飞贼黄莺”系列小说可以入选;还考虑到早期香港文学的一些现象:有些生平不可考,是否同属一人执笔亦未可知,但在香港报刊上常见署以同一名字的作品。

这几个原则当然没有完全解决众多争议,如果有例外,则在该卷“导言”交代清楚。编撰过程中,众多编委都

以“香港文学”为据,而不是歧义更多的“香港作家”概念作为选择标准。概括来说,大家同意《香港文学大系》中的“香港”,应该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空间的概念:“香港文学”应该是与此一文化空间形成共构关系的文学。香港作为文化空间,足以容纳与其他文化环境不同的文学内容或形式,或者促进文学观念与文本的流转和传播,影响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南洋和其他华语语系文学,甚至不同语种的文学,同时又接受不同领域文学的影响。

链接

已出版的《香港文学大系》各卷:

新诗卷(陈智德主编)

该卷选录1949年以前在香港发表的新诗,根据目前所见的文献资料,本卷实际选录1925年至1949年的作品,横跨战前时期、抗战时期与战后初期的不同阶段,兼容不同时期的各种流派和风格,艺术价值与文献价值并重。

散文卷一(樊善标主编)

该卷选录1920年代中期至1941年香港沦陷之前的散文作品,主要来自香港出版的报纸副刊和期刊,少数选自单行本。该卷包括美文、小品、杂文、特写、通讯等类型,兼容本地及非本地话题。

散文卷二(危令敦主编)

本该卷选录1942年至1949年间,在日据与战后两个历史时期,香港报刊所刊载的散文以及个人文集里的篇章。香港本地作家与南来名家的作品兼收,说理、叙事、记人、抒情、表意、状物、写景各种体例均备。

旧体文学卷(程中山主编)

该卷选编从开埠到民国百多年间香港的旧体文学,各种风格具备,中西思想并重;题材丰富,或述人生际遇,或写江山风月,或反映家国时局,时代色彩极为鲜明。

通俗文学卷(黄仲鸣主编)

该卷力图纠正通俗文学素被视为边缘文学这一偏见,时限晚清直至1949年。文类包括言情、技击、侦探、社会等小说;另如赋于新义的笔记、粤讴、龙舟、班本等作品,都有收入;文体包括文言、白话、粤方言、三及第等。

儿童文学卷(霍玉英主编)

该卷收录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末在香港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涵盖理论、诗歌、童话、故事、戏剧、寓言及漫画,展示香港早期儿童文学发展的面貌,并反映在独特社会文化背景下,成人对儿童、童年及儿童文学的理解。

“海外汉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新方向”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日前,“跨文化论坛2014:海外汉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新方向”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此次学术研讨会由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举办。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日本、南非等地的6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海外汉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主题,就“新世纪以来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海外汉学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拓展”、“比较文学的新视角:海外汉学研究的方法、理论”和“回归文学性:比较文学研究新方向”等议题展开讨论。

在“中国文化研究”这一主题下,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严绍璁分别从“文化自觉”以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文化学本质”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乐黛云认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赞成和而不同,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其多元性。要想在世界文化浪潮中站稳脚跟,中国文化需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解决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是重视交流的,在文化发展中,要把不同的文化精髓结合在一起,创造新的文化,向未来的文化发展开新的起点并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要重视文化自省,而中国文化自省的源头应该回到古典,从传统中汲取力量。严绍璁在探讨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时特别强调,应注重对国学者研究以及中国学者对对象国学者研究的反馈;同时他认为,用“国际中国学”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说法来代替“国际汉学”这一说法更具科学性。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有了蓬勃发展,此次研讨会上,很多学者关注了海外如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汉学家的文化研究和阐释情况。王晓平、赵季就从不

同角度探讨了日本文学中独特的文学样式——汉诗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诗话文化,梳理了日本诗话发展的脉络,从中可见中国文化在对外流传中对异域文化产生的影响和流变。李庆本分析了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的跨文化阐释,认为宇文所安的阐释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和思维习惯为基础,细致解读中国文学作品,是一种生命体验和理性思维并重的阐释模式,这种模式与美国汉学发展的新方向一致,可以突破区域研究的限定,使中国文学有可能被更广泛的西方读者所理解接受,有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张西平则从宏观角度关注了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典籍这一文化现象,他认为,要进入历史研究中国典籍外译的人口和基础,并从历史和语言两个角度肯定了汉学家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

中国文化的译介传播自古有之,与外界的交流也给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带来别样的色彩,探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离不开方法论和对具体形式的观照。贺莉莹从戏剧主题、舞台设计和表演技术三个方面来论述德语戏剧中的中国元素,17世纪维也纳宫廷中就已经出现中国题材的娱乐戏剧,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德戏剧交流进入新阶段,两国艺术家合作创作戏剧,使不同的戏剧文化有了深层次的互动,诞生了新的舞台形式。杜庆龙则通过梳理莫言作品在美国的基本译介现状,集合其作品的研究和传播情况,探讨其作品在美国的影响,他认为,莫言作品在美国的译介和传播的成功成为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奏。

此外,刘枫、耿幼壮、陈跃红、阎纯德等学者分别围绕世界史观与启蒙史观、韩学研究与文学研究、汉学范式与中国问题以及汉学与国学等多个主题展开研讨。(华 文)

作家林湄新作《天外》研讨会举行

日前,荷兰籍华裔作家林湄的新作《天外》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近日《天外》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林湄1990年移居荷兰,从事专业创作,已出过长篇小说《泪洒苦行路》《漂泊》《浮生外记》《天望》等15部作品。作为《天望》的姊妹篇,小说《天外》的创作同样耗费了林湄10年的时间。林湄称,小说的每一章、每一个人物都寄托了她对社会、人性、生存、高科技发展的沉思。书里的人物均是现实生活中群体的代表,小说集中展现了平凡人的生活、际遇和命运,表达了人生的劳苦与愁烦及无奈焦虑的存在。

杨匡汉认为,《天外》把传统和现代联系起来,小说中不同文化观点、不同文化气质融汇,作者以伞状结构铺展小说,最终集于一条思想的主线。肖复兴认为这种结构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写法,将多种元素开放式融合在一起,着墨于对精神上的需求、对精神深度的拷问、灵魂上的自我责难。杨恒达谈到了《天外》中人物的浮士德精神。他认为当

当我读到水月《挥手之后还会再见吗·十年》所言:“我的写作慰藉情感,我写给自己,也写给读者。”便认同她对自己写作的定义即来自本心。水月的人与文相生相应,其文大多写于工作之余,发于报纸专栏;她笔下的微尘与世间情感,也生于寻常生活及其人伦与情爱,加上水月充满岭南文韵的女性笔调,清新洁净,平实散淡,让人与作者同素心共明月。

水月工十年之久坚持在《澳门日报》写“美丽街”栏目,因为她言说着澳门的八面来风,描述澳门的人间百态,写的是澳门的人间精神,一文一得,既世情淡泊,又能穿街而过,循入澳门市井小巷,素朴洗练,却美丽隽永。水月的散文虽浅显,但源于对日常生活的洞见与发现,带着自己的体温心性,在澳门多元的日常生活点滴中,建构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精神世界,在寻常生活中发现与追寻生命的意义,讨论殖民文化的冲突,言说着生命的欢欣与忧伤,叩问女性生存的矛盾与不平,以率真展露人心并直抵本质。这也是她的人生态度:“人生中有些事情来得太早,另一些又太晚,在逆向人生中感悟生命,认为人生的经纬线跟地球一样,绕了很多圈,还是紧密相连的。”比如年幼失怙,母亲独自抚养一家五口、弟弟早逝,几经凄风冷雨,水月还能淡然处世,是因为“生命的终极意义问题是无解的”,“把这个问题悬置起来,尽量不想或少想它。这样,在已知的限度内,我们反而能更好地安排人生”。

她在日常生活的追尋中,重構著一個自己的精神家園,并且充滿宿命感以及女性的愛心。她說,“創作最重要的元素,必然是愛”,這也是其作品的底色。

这个精神家园是散文集《忘情书》中对已经远去的人与事的追忆,是《挥手之后还会再见吗》中的追问,是对亲人的爱的言说以及一个女孩成长的记忆。比如她与行将离世的弟弟讨论关于“父亲的遗憾”,作为遗腹子的弟弟与只留下模糊父亲形象的作者,对于父爱的缺失,真的是“像寒天饮冰水,冷暖自知”,善解人意的作者明白弟弟放下幼小的孩子,“没能看着孩子长大,是父亲的遗憾”,姐弟俩静静地讨论父亲有无对孩子成长的意义,把随时可能来造访的死神关在病房之外。水月许多篇什都如此细腻沉静,颇具白描功夫。

水月钟爱台湾作家三毛,她不惜笔墨解读三毛,既憧憬自己能像三毛那样忠于本心,以身心独行远方;也希望能像三毛一样“纯粹以一颗女人心来看世界,体会身边的人与事,发出一点赞叹,一点感悟,一点悲悯”。她以《如果爱》系列文字讨论男权社会中女性寻常日子不平,冲突乃至和解,赞美物质与精神独立的女性,她不仅权但充满女性精神,颇具现代性。她像三毛一样写私人日记,以充满真情的文字,记录一些个人的小事;也如三毛一样认为,“我的文章挑不出一些一般人认为有深度的人性矛盾的地方,也许好的文学对人性的描写比较深刻,但是,我长大后不喜欢说谎,记录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而我真实的生活里,接触的都是爱”。这是作者自内向外地对三毛文学创作观的实践。毕竟,散文不仅限于真我相见,还需要更强大的穿透世道人心的力量,水月素心之下,或可还能努力通往大方大智?

如果说,寻常是水月散文的关键词,爱便是水月小说的关键词。水月“第二届澳门中篇小说征稿活动”的获奖作品《回首》同样是一首爱的颂歌。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女生单单有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名字。一场车祸横空而降,单单身世的罗生门就此开启。剥去往日甜腻的外衣后,不堪回首的身世命运一点浮现出来……故事虽然有通俗小说的元素,但其笔触深入到人生以及命运的无常,也探寻到人性更隐秘的深处,尤其塑造了隐忍内敛、坚强尚善的母亲形象。作者展示了单单满心的爱意从失落到重拾的过程,在闺蜜小青、母亲的初恋情人袁晨曦、老板甄立文的爱心援助下,内心步步回暖并找回了爱的能力,更加珍惜养母的无私奉献。单单在历经人生变数的悲凉之后,也找到了直面世界的方式,找回了自我。故事简约,线性结构叙述虽简单,却颇具内在的节奏感,层次分明,可读性强,既充满宿命感,又内蕴着女性的悲凉和慈悲。

作者擅长书写坚硬如水的女性形象,如阿梅、阿菊等,她们勤勉善良,不顾一切寻求人生翻盘的机会,甚至因生存困境铤而走险,阿梅更是因筹钱为母亲治病,偷渡澳门甚至献身并为此一生不嫁。在她们身上,屈辱与尊严、乡愁与乡情、隐忍与强大、善良与抗争、竞争与无常相生相应。单单玲被生活一点点击垮,在难产去世前,把自己的“澳门临时逗留登记”交给没有登记上的阿梅,而阿梅也以抚养单单为回报……小说整体充满一种对弱势群体或人物命运无法割舍的情感,充满着同情、理解与悲悯。小说虽然是小叙事,却令我们触摸到博大无私的母爱以及对父爱渴求的精确描述,在一定程度上透过现象直抵了世界与人性的本质,揭示了人性的深度。

水月还有着可贵的文体自觉,她明白散文是独白的艺术,是自述,必须真我相见,容不得虚构。而小说是叙述,必须深潜虚实之道。她明白小说应该在生活况味和小说意味上多些诗性。作者在叙述上并行设置了阿菊灵魂出窍的叙事,似虚似实,人物对话的双关意蕴,有计白当黑之功用。正当我们要质疑阿菊一直在阿梅病房游荡旁白,却迟迟不现身揭开真相之时,结尾处医院护士们的对话,才令我们得知阿菊的凄惨:刚刚离世却无处安魂。阿菊在原乡广东与新乡澳门徘徊,没有了家园。偶然遭遇阿菊的故事背后,常常是发人深省的必然。阿菊的灵魂游走,不仅推进了故事,使人物内心世界外化,也使读者更了解人物幽微的内心世界,还使小说因另有细节而富有意义,深切揭示了独在异乡少小离家的异客们漂泊的异化空间,他们叶落却难以归根的凄惶,这是一代澳门移民的坎坷命运。所幸,阿菊的儿子终于可以踏进澳门为母亲收殓,“阿菊姐,你一路走好”,水月最后还是以爱心为小说也为澳门移民的未来赋予了人性的宽度和温度。

水月的散文集《忘情书》是为了不能忘情,《挥手之后还会再见吗》是希望再见,小说《回首》却是不堪回首,她希望寻常生活充满爱意与温暖,这是生活原初的愿望,水月在写作中也以自我完成了一个重返初心的故事。



香港画家陆国源油画作品

